

明朝“大一统”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演进

崔华青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65)

摘要: 明朝作为承元启清的关键王朝,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它以“大一统”为核心, 继承元朝“华夷一统”遗产, 通过疆域治理、文化融通、经济联通的多元实践, 构建起“疆域一体、文化同源、经济共生”的多元一体格局。实践中, 明朝迁都北京、设羁縻卫所、推改土归流强化疆域整合; 以儒学创新普及、儒释道融合、伊儒会通深化文化交融; 依托茶马贸易、朝贡体系与全国统一市场搭建经济共生网络, 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孕育中华民族共同体雏形。这一治理实践既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统一, 为清朝多民族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更有力回应了“新清史”“内亚史观”等错误论调。其经验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善边疆治理、强化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提供了深厚历史镜鉴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 明朝; 大一统; 中华民族共同体; 多元一体; 文化融通; 边疆治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255

一. 引言

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是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与历代王朝治理实践持续积淀的历史成果。从秦汉“大一统”理念奠基到元朝疆域整合的突破性进展, 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在传承中不断革新,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演进积累了深厚历史经验。明朝作为承接元朝大一统遗产的关键王朝, 并未简单承袭, 而是以主动的制度创新与治理完善, 为清代以来的中国始终能保持统一形态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①, 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向更深层次发展, 成为其从“自在”向“自觉”过渡的重要历史阶段。

政治上, 明朝创造性构建了行省、土司与羁縻卫所并行的多元治理体系, 行省制度强化中央对中原及内地边疆的垂直管辖, 保障国家治理的统一性; 土司制度尊重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治理传统, 用“以夷治夷”实现柔性纳入; 羁縻卫所则通过册封、朝贡联结北方、西北游牧区域, 三者互补协同, 以“因俗而治”打破中原与边疆的政治壁垒, 形成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经济层面, 屯田开发既解决了边疆戍守的物资补给, 又推动中原农耕技术向边疆传播, 促进了边疆经济开发; 茶马互市、边境贸易则搭建起资源流通桥梁, 中原的丝绸、茶叶与边疆的畜牧产品、矿产形成互补互通, 强化了各民族的经济依存关系。文化交融则呈现鲜明双向性, 儒家文化通过官学推广、地方教化等渠道向边疆渗透, “大一统”、“和而不同”等理念成为多民族共同的价值基础; 同时, 边疆民族的生产技艺、艺术形式、习俗信仰也向中原传播, 各民族文化在互鉴中共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内涵。

诚然, 明代后期受封建制度内在僵化、官僚体系低效以及全球变局下应对能力不足的影响, 其多民族治理成效受到制约, 未能完全破解边疆治理与民族整合的长期难题, 但这并不否定其历史价值。明朝的治理实践既继承了前代“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 又以系统性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探索, 为后世边疆治理和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借鉴,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中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二. 明朝“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

(一) 思想根基: “大一统”理念的继承与革新

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②, 历经先秦诸子的理论奠基、汉唐的实践发展, 至元朝形成“华夷一统”的政治格局。明朝建立后, 统治者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 结合时代需求进行理论革新,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指引。

朱元璋即位后, 明确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 在《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宣称“汉唐宋之迭兴, 以至于元, 皆能混一寰宇, 绍正大统, 以承天休”^③, 将元朝纳入中国历史的正统谱系, 这一举措突破了传统“夷夏之辨”的狭隘认知, 为“华夷一家”的治理理念奠定了政治基础。明成祖朱棣进一步提出“天下一统, 华夷一家”^④的口

作者简介: 崔华青 (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学

^①狄鸿旭:《疆域一体与文化融通: 明朝时期中华民族稳固壮大的重要特征》, 贵州民族研究, 2025, 46(01): 68-75

^②班固:《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2523页,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③李修生:《全元文》卷一五二三, 118页,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4

^④《明太宗实录》卷三十, 533页, 台北, 史语所校印本, 1962

号，将“大一统”从单纯的疆域统一升华为包含民族平等、文化包容的共同体理念。

明朝“大一统”思想的革新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在天下观上，突破“中原中心”的地理局限，将蒙古高原、青藏高原、西南边疆等纳入“天下”范畴，构建“京师—内地—边疆”的空间治理体系；其二，在华夷观上，从“华夷之防”转向“华夷无间”，朱元璋提出“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我赤子”^①，强调各民族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地位；其三，在治理观上，融合“王道”与“霸道”，形成“以德怀之、以威服之”的双重治理逻辑，既注重道德教化，又强化军事威慑，实现“威德兼施”的治理目标。

（二）文化内核：“和合”思想与多元认同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其中的精髓之一。‘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②“和合”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明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内核。朱元璋强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③，明初即设立“僧录司”“道录司”统管全国宗教事务，同时规定儒士可参与宗教典籍的校勘与阐释，形成“儒主政、释道辅化”的格局。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组织儒臣与高僧共同编纂《禅林宝训》，将儒家“仁政”“孝悌”思想融入佛教教义；永乐年间编纂的《道藏》，特意收录儒家《大学衍义》等典籍，实现三教义理的互释互通。这种制度设计打破了三教壁垒，科举出身的官员需了解释道基本教义以应对边疆治理（如与西藏宗教领袖沟通），僧道则需恪守儒家伦理以获得官方认可，最终形成“以儒为骨、释道为翼”的文化共同体基础。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以文化包容凝聚社会共识，这一思想贯穿于明朝治理实践的全过程，推动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

在文化认同构建上，明朝形成了“主脉引领、多元共生”的格局。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脉，通过科举制度、学校教育向全国推广，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明朝在西南土司地区建立官营120所、书院49所，在广西创设社学232所^④，通过儒家教化培育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同时，明朝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推行“因俗而治”的文化政策，如在西藏尊崇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允许萨满教与藏传佛教并存，形成了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局面。

（三）政治正当性：正统观的重构与共同体认同

明朝统治者通过重构正统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政治正当性。朱元璋在《讨元檄文》中虽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⑤的口号，但这并非狭隘的民族复仇，而是动员民众反抗元朝暴政的策略性表述。明朝建立后迅速完成正统叙事的战略转向，摒弃临时性的族群动员话语，确立“天命所归”的核心叙事框架。朱元璋在登基诏书中明确宣称“帝王之兴，必承天命，将政权合法性从‘复汉’转向‘混一寰宇、安抚万民’的共同体责任，提出“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莫不臣服”^⑥的治理愿景。这种转向在制度层面体现为对多元族群的包容政策：对蒙古、色目等族群“愿为臣民者，与华夏之人抚养无异”，在科举、仕宦中一视同仁；对西南边疆民族推行土司制度，既承认其地方治理权，又将其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谱系，实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⑦的柔性整合。

这种正统观的重构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避免了历史断裂，维护了中华民族历史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将“大一统”作为正统性的核心标准，强化了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正如邓云所言，明朝通过“天命—正统”的谱系建构，巧妙转化了元朝遗留的多元民族格局，既未否定元朝统治下形成的多民族共存现状，又将其整合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资源，通过“正合法性”的赋予，让各民族群体都能在“大明天下”的框架内找到身份归属。这种重构后的正统观，既延续了华夏文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核心理念，又回应了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与思想根基^⑧。

三、疆域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空间基础与治理实践

（一）疆域整合：从“混一寰宇”到“疆域一体”

元朝“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⑨，奠定中国疆域基本格局，并开创行省制度为大一统国家的行政架构奠定了基础，但蒙古贵族的“四等人制”存在鲜明的民族歧视色彩，未能形成有效的多民族整合机制。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1048页，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② 殷晓元、张如意：《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0(02):65-72.

^③ 姚士观：《明太祖文集》卷十，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6

^④ 蒙荫昭、梁全进：《广西教育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402页，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⑥ 《明太祖实录》卷三七，731页，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⑦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1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⑧ 邓云：《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明朝“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2(05):114-125.

^⑨ 宋濂，等：《元史》卷五八《地理志》，13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①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通过军事统一与制度创新，一方面继承元朝“大一统”的政治遗产，将疆域范围稳定在长城以内、青藏高原以东、南海以北的核心区域；另一方面通过制度革新，构建起“行省—土司—羁縻卫所”三位一体的多元治理体系，打破了元朝的民族隔离政策，实现了“因俗而治”与中央集权的有机统一，推动“疆域一体”深度整合，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基础。

在北方边疆，明朝采取“军事防御和政治招抚”双重策略。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天子戍边”决心强化对北方边疆控制，形成“以北京为中心，辐射蒙古高原”的治理格局。同时，通过册封鞑靼、瓦剌部首领为“顺义王”“顺宁王”等，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实现“以贡促融”。俺答封贡后，长城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蒙古高原与中原地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格局。

在西南边疆，明朝进行重大行政建制创新。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布政使司，结束贵州分隶四川、湖广、云南的历史，正式建省。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中央对西南地区管辖，更促进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明朝在西南推行土司制度，同时逐步推进改土归流，至明末共设土司近1300家，改土归流90余家，为清朝彻底推行改土归流奠定基础。

在东北与西藏地区，明朝创新治理模式实现有效管辖。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及百余卫所，任命当地族群首领为官员，通过“诰敕、印信、袈衣”等信物确立隶属关系，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纳入中国疆域^②。西藏推行“多封众建”政策，册封阐化王、护教王等五王及三大法王，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等机构，强化中央对西藏的行政管辖。^③

（二）治理创新：因地制宜的边疆治理体系

明朝针对不同边疆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文化传统，构建多元化边疆治理体系，体现“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治理智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整合提供制度保障。

在治理模式上，明朝形成“羁縻卫所制—土司制度—流官治理”的梯度体系。东北、北方等民族聚居区实行羁縻卫所制，保留当地民族社会结构与风俗习惯，通过册封首领实现间接管辖；在西南边疆，明朝并未强行移植中原的州县制度，而是在土司制度基础上创新治理模式，不仅承认当地土著酋长的世袭权力，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生活习俗，还针对性地认可少数民族地区女性承袭土官的传统。明初贵州彝族女首领奢香夫人在丈夫遇害后，便得以合法承袭宣慰使职位，她还因维护边疆稳定、开通龙场九驿的功绩，被朱元璋册封为“顺德夫人”。同时，明朝还通过规范土司承袭流程、要求土司履行朝贡与征调义务等方式，将其纳入中央管控体系，更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儒学读书方可承袭职位，以文教之力推动儒家文化在边疆的传播，实现了“在差异中凝聚共识”的治理目标；内地与边疆过渡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实现流官直接治理，推动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

在治理手段上，明朝注重“柔性治理”与“刚性控制”结合。柔性治理方面，通过朝贡贸易、茶马互市等经济手段强化边疆与内地联系，西南茶马贸易“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④，成为民族交融重要纽带。刚性控制方面，通过设置卫所、修建长城、移民屯田等方式强化边疆军事防御与人口整合，明初向云南调兵25万人，加上家属约七八十万人，大规模军事移民改变西南人口结构，促进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

（三）生境共建：人口流动与区域融合

人口流动是推动“华夷一体”的重要动力，明朝通过政府组织移民与民间自发迁徙，形成多民族交错杂居格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境基础。明初，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屯田活动。北方从山西、塞外蒙古等地迁徙军民充实北平；南方通过“调北征南”“调北填南”组织军民向西南迁徙，《明实录》《明史》记载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间明朝组织移民达18次。明中后期，“嘉靖年间，由于四川饥荒，流民入境者络绎不绝，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⑤，受人口增长与土地矛盾影响，大量内地人口自发向边疆迁徙。

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多方面融合效应。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艺随移民浪潮传入边疆，而边疆独特的畜牧经验与作物品种也反向流入内地，逐渐形成农牧互补、农商共生的良性经济格局。文化层面的交融同样深刻，移民携带的儒家文化理念、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与边疆各民族的本土文化相互碰撞、彼此浸润，孕育出兼具多元特质的区域文化形态。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更打破了传统的族群边界，通婚联姻、商贸往来等民间互动日益频繁，各民族在朝夕相处中加深理解、凝聚情感，逐渐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紧密依存关系。

四、文化融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与认同塑造

（一）儒家思想的创新与普及：文化认同的主脉引领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核心，在明朝得到创新发展与广泛普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主脉之一。明朝初期以“程朱理学”为正统，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确立儒家思想官方地位；明中期以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8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四《女直》，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③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十一《列传·西域三》，85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19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庞思纯，徐华健：《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后,王阳明心学兴起,对程朱理学进行革新,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使儒家思想更具实践性与包容性。

明朝的教育体系分为中央教育(太学、国子监)与地方教育(府学、州学、县学、卫学、社学),其中卫学与社学是向边疆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平台。卫学设立于卫所所在地,主要面向卫所士兵及其子弟,同时允许边疆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社学设立于乡村、土司地区,面向普通民众,“凡府州县乡村,令有司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通过教育体系构建,推动儒家思想向边疆与民间普及。中央设立国子监,接纳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洪武二十三年(1390)“云南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罗罗生二人,请入国子监读书,各赐钞锭^①。地方建立府学、州学、县学三级官学体系,在边疆地区广设社学、书院,规定“土官应袭,三十以下者得入学习礼,不由儒学者不得起送承袭”^②,将儒家教育与土司承袭挂钩,强化儒家文化传播。

儒家思想普及也带来了深刻认同效应,边疆民族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接受“大一统”“忠君爱国”等价值观念,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少数民族土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成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文化纽带,云南地区“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川埒矣”^③,展现儒家文化对边疆的教化作用。

(二) 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 共同体精神的丰富内涵

明朝突破单一文化局限,推动儒释道三教融合、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会通,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儒释道三教融合在明朝达到顶峰。朱元璋强调“三教之立,其所济给之理一”,成化帝亲绘《一团和气图》喻示三教合流;晚明林兆恩创立“三一教”,对三教融合进行理论建构^④。三教融合深入民间,关帝信仰融合儒家忠义、佛教慈悲、道教神威,成为各民族共同信仰符号,传播至蒙古、西藏等地区,成为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⑤。

各民族文化深度交融同样是明朝文化融通的重要表现。蒙藏地区,藏传佛教向蒙古传播,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仰华寺会盟,“佛法主要是代替萨满杀生祭祀,化血海为乳海,并使蒙古不再抢掠汉族、藏族”^⑥;西南地区,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云南大理“八大碗”菜式源于中原,十二生肖观念传入贵州后融入地方文化。

在宗教文化层面,明朝实行“包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允许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多种宗教并存,促进了各宗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即黄教在明朝得到扶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始于明朝,藏传佛教的寺庙建筑、宗教仪式传入中原,与汉传佛教融合;伊斯兰教在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中广泛传播,明朝在西安、北京等地修建清真寺,允许穆斯林自由传教,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深度融合,穆斯林学者以儒解经,吸收儒家“仁义”“忠孝”思想,提出“君臣家国,休戚相关”的主张,实现伊斯兰教中国化,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的教义、习俗与中原文化相互包容,形成“伊儒会通”局面;道教在明朝达到鼎盛,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成为中原道教文化的代表,同时道教的养生理念、武术技艺传入边疆,影响了边疆民族的生活方式,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茶山瑶至迟在明代开始信仰道教中的符篆派,主张“以善化道,符水治病”,信奉道教诸神,同时又保留了本族固有的原始宗教,佛教、儒教的一些观念以附属形式偶尔出现在瑶族的道经中,形成瑶族特有的宗教信仰,至今保留着做功德、回村龙等仪式^⑦。

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会通也进一步拓展共同体文化视野。郑和七下西洋加强了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文化交流;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天文、历法等知识,与儒家思想相互激荡,同时注意向西方介绍中国,中国文化被广泛传播到西方社会,拉开了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序幕,为西方社会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对之后数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⑧。

(三) 民间文化的繁荣: 共同体认同的社会基础

明朝民间文化繁荣,推动共同体认同向基层社会渗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奠定广泛社会基础。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兴起,通俗文学、民间艺术蓬勃发展,《西游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经典文学作品流传广泛,不仅在汉族地区家喻户晓,更传播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资源。这些民间文学作品蕴含“大一统”“忠义”“家国情怀”等价值观念,通过故事传播潜移默化塑造各民族认同。《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忠义精神,《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坚韧不拔精神,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同时,民间艺术如戏曲、说唱等成为文化传播重要载体,在边疆地区演出中融入中原文化元素,促进文化认同形成。

民间信仰传播也强化共同体认同。除关帝信仰外,观音信仰、妈祖信仰等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妈祖信仰从福建传播至台湾地区、海南及东南亚地区,成为沿海各民族共同信仰;观音信仰在西藏、蒙古地区与藏传佛教融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三, 3040页, 台北, 史语所校印本, 1962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十, 584页, 台北, 史语所校印本, 1962

^③ 谢肇淛:《滇略》,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0

^④ 韩星:《儒道佛之间:三国至清末历代朝廷处理三教关系的模式·特征·经验》,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6(02): 5-13.

^⑤ 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⑥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9

^⑦ 奉恒高, 等:《茶山瑶历史与文化》, 318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⑧ 潘岳, 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 255页,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2023

合,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这些民间信仰蕴含的“向善”“和谐”“团结”等价值追求,强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共鸣。

五.经济互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物质保障与交往动力

(一)经济网络的构建:从区域经济到全国统一市场

明朝在实现疆域统一后,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引导,搭建起“内地—边疆—域外”互联互通的经济网络,推动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筑牢了物质根基。

在国内经济网络构建上,明朝实施了三大核心举措:一是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及杂税合并,按亩征银,打破实物税桎梏,解放劳动力,刺激农产品商品化,助推商品经济兴起;二是强化交通建设,修复大运河、完善驿传制度,打通南北商品流通通道,形成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降低商品流通成本;三是规范货币体系,确立白银主导货币地位,形成“银钱兼用”制度,消除货币流通壁垒,保障跨区域商品交换顺畅。这些举措促成了区域分工互补的统一市场,中原及江南地区是粮食、丝绸、茶叶、瓷器等农产品与高端手工业品主产区;边疆地区供应马匹、毛皮、药材等特色产品;沿海地区则作为内外市场枢纽,出口国内商品,进口海外香料、白银等物资。

为保障商品流通,明朝建立了多元化贸易渠道:以朝贡贸易维系边疆及域外政治经济联系;在边境开设马市、茶市等官方互市;民间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最终形成“中原依赖边疆畜牧产品,边疆依赖中原农工产品”的共生格局。这种经济深度依存,既强化了区域物质联系,也增进了民族交流认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坚实物质保障。

(二)茶马贸易:边疆经济融合的典范

茶马贸易作为明朝边疆治理的重要经济手段,其核心是通过茶叶与马匹的贸易,满足中原王朝的军事需求和边疆民族的生活需求,同时强化民族间的经济依赖与政治认同^①,在促进西南、西北边疆与内地经济融合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纽带。

茶叶是边疆少数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必需品,“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而马匹是明朝军队的重要战略物资,“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明朝为垄断茶马贸易,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茶马司,在西北、西南边疆设立了秦州茶马司、河州茶马司、洮州茶马司、雅州茶马司等,负责茶叶收购、马匹征集与贸易管理,建立起严密的茶马贸易制度,垄断茶叶生产与流通,通过“以茶易马”换取边疆少数民族的马匹,既满足军事需求,又强化经济联系。西南地区茶马贸易尤为繁荣,川藏、滇藏茶马古道成为重要贸易通道,“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②。

明朝的茶马贸易分为“官市”与“民市”,官市由政府主导,规定“上马给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严禁私人交易;民市则在官市之外,允许民间商人进行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茶马互市的推行,不仅满足了明朝的军事需求,更促进了区域间的资源配置与市场互通。例如,西北的茶马互市中,中原的茶叶、丝绸、铁器通过茶马司传入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地区,边疆的马匹、皮毛、药材传入中原;西南的茶马互市中,四川、云南的茶叶传入西藏,西藏的马匹、酥油、藏香传入内地。

除茶马贸易外,明朝还在边疆地区设立“互市场所”,如北方的宣大互市、辽东互市,允许中原与边疆民族进行全面的商品贸易。宣大互市(即宣化、大同两地)是北方最大的互市场所,“每年互市,官民贸易,络绎不绝”,中原的粮食、布匹、瓷器、茶叶与蒙古的马匹、皮毛、盐碱等商品在此交易,形成了跨区域的市场网络。辽东互市则连接中原与东北地区,女真族的人参、貂皮、海东青与中原的铁器、农具、丝绸等商品的贸易,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

茶马贸易与互市场所的设立,使中原与边疆形成了互补的经济格局,各民族在商品交换中形成了经济依赖,进而强化了政治认同。明朝通过控制茶叶流通,“以茶驭番”,使边疆少数民族“得茶则生,不得则死”,从而强化对边疆的控制,实现“内充军实,外驭诸番”的治理目标^③。蒙古部落通过互市获得茶叶、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对明朝的经济依赖逐渐增强,客观上减少了边境冲突;西藏通过茶马贸易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促进了藏汉民族的融合。这种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朝贡贸易与海外贸易:经济融合的拓展与延伸

朝贡贸易是明朝官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交往形式,既具有政治属性,又具有经济功能,在促进中华民族与周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强化了边疆地区与中央的联系。明朝推行“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对前来朝贡的国家与民族给予丰厚赏赐,吸引周边少数民族首领频繁入贡。蒙古、西藏、西南土司等边疆民族通过朝贡,获得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确立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朝贡贸易中的“回赐”与“贡品”交换,实质是中央与边疆的经济互补,强化了“华夷一体”的经济联系。

海外贸易的发展拓展了经济融合的范围。明朝初期,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船队携带大量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进行贸易,换回香料、宝石、药材等特产。尽管明朝后期实

^① 陈盈诺,霍维洪:《从茶马贸易看明代西南边疆治理》,民族学论丛,2024,(04):56-65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19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40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行海禁政策,但民间海外贸易并未中断,沿海商人通过走私、互市等方式与海外进行贸易,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局面。

海外贸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意义深远。贸易往来推动沿海地区形成广州、泉州、宁波等核心港口城市,这些城市既是商品集散的枢纽,更成为连接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纽带,加速了区域间的资源流通与产业互补,让沿海经济与内地发展深度绑定、协同共进。与此同时,海外贸易的开拓过程也不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海洋意识,沿海各族民众在应对航行风险、拓展贸易渠道的过程中,逐渐培育出“同舟共济”的协作精神,这种在实践中凝聚的向心力,进一步夯实了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同时丝绸、瓷器、茶叶等承载着中华文明特质的商品,随贸易航线走向世界,既向海外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精湛技艺,也让中华民族在文化输出中深化了自身认同,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为共同体的精神建构注入持久动力。

六.明朝“大一统”共同体实践的历史脉络及接续

明朝“大一统”的治理实践,并非孤立存在的历史现象,而是深度嵌入中华民族数千年“多元一体”演进的历史长河,上承元朝“华夷混一”的政治遗产,下启清朝多民族国家的鼎盛格局,其历史脉络与传承价值,需置于元明清三朝连续演进中方能明晰。从疆域治理到文化认同,从制度设计到民族交融,明朝以务实创新的实践,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与发展铺就了关键路径,其影响既贯穿于有明一代,更深刻塑造了后世王朝的治理范式。^①

元朝首次实现了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中原内地与边疆远域的全面统合,打破了传统“华夷之防”的地理与观念壁垒。但元朝“内政不修,善政难行”,未能找到适配农牧二元格局的治理路径,仅存世不足百年便土崩瓦解。明朝立国后,并未割裂与元朝的历史联结,而是以“天命所归”的正统叙事,承认元朝的历史地位,主动继承其疆域遗产与“华夷一统”理念。在疆域治理上,明朝沿用元朝的行省制度框架,创新发展羁縻卫所、土司制度,将黑龙江流域、西藏地区、西南边疆等纳入有效管辖,延续了“天下一家”的治理格局;在文化政策上,明朝重拾儒家文化主脉,同时兼容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信仰,继承了元朝“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这种对前代遗产的批判性继承,避免了历史断裂,确保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连续性。

明朝的治理实践,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鼎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的历史链条。在疆域整合上,明朝迁都北京“天子戍边”,强化了对北方农牧区域的统摄,为清朝定都北京、巩固北方边疆提供了政治地理范本;其在西南推行的改土归流,虽未彻底完成,但“土流共治”的过渡模式与实践经验,为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扫清了障碍,使西南边疆彻底融入中央集权体系。在民族政策上,明朝“华夷一家”“因俗而治”的理念,被清朝直接承袭并发展,康熙皇帝所言“中外一家”、雍正皇帝强调“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②,正是对明朝治理思想的延续与升华;清朝继续对西藏“多封众建”的政策,亦脱胎于明朝对藏区的册封体系,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在文化认同上,明朝普及儒学、推动多元文化交融的实践,使儒家思想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清朝沿用科举制度、尊崇儒家正统,延续了这一文化整合路径,康熙皇帝六次遣官拜祭明孝陵、手书“治隆唐宋”,既彰显了对明朝正统地位的承认,也印证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明朝的治理实践,更以扎实的历史事实,回应了后世“新清史”“内亚史观”等错误论调的虚妄。“新清史”将清朝解构为“中亚帝国”,割裂其与中国历史的联系;“内亚史观”刻意对立农牧文明,否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③。而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创新农牧区域统合模式,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清晰展现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元朝“华夷一统”到明朝“天下一家”,再到清朝“中外一家”,三朝一脉相承的“大一统”追求,证明了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不存在所谓“汉族中国”与“内亚帝国”的对立。明朝通过迁都、屯田、互市、教化等一系列举措,使农耕与游牧区域深度联结、各民族文化相互浸润,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依存关系,这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历史写照。

结语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绵延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经孕育、萌芽、形成等过程,在新时代得到不断强化与升华。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从自觉到更大自觉的逻辑演进过程,深刻体现了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④明朝“大一统”实践蕴含的治理智慧,历经数百年传承,至今仍具深刻的借鉴价值。其“因俗而治”的柔性治理策略,既尊重民族差异又强化中央集权,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范本,既不可强求一律,也不可放任自流,唯有在尊重差异中强化共同性,方能实现长治久安。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从明朝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坚持“多元一体”的治理理念,既保护各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又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进步,让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阶段焕发更旺盛的生命力。“在新时代的实践中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能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深叶茂,让中华文明在连续性、包容性中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 ① 田澍:《承前启后:明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06):50-55.
- ② 《清实录》第八册《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十三,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 ③ 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历史研究,2022,(03):22-32.
- ④ 马冬梅,李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08):12-18.

- [1] 狄鸿旭.疆域一体与文化融通:明朝时期中华民族稳固壮大的重要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2025,46(01):68-75.
-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3] 李修生.全元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 [4] 明太宗实录[M].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 [5] 明太祖实录[M].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 [6] 殷晓元,张如意.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中华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0(02):65-72.
- [7] 姚士观.明太祖文集[M].台北: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6
- [8] 蒙荫昭,梁全进.广西教育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 [9]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0] 邓云.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明朝“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2(05):114-125..
- [11] 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2]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3]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4] 庞思纯,徐华健.历史视野下的黔赣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 [15] 明世宗实录[M].台北:史语所校印本,1962
- [16] 谢肇淛.滇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 [17] 韩星.儒道佛之间:三国至清末历代朝廷处理三教关系的模式·特征·经验[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6(02):5-13.
- [18] 加央平措.关帝信仰与格萨尔崇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 [19]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 [20] 奉恒高,等.茶山瑶历史与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 [21] 潘岳,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
- [22] 陈盈诺,霍维洮.从茶马贸易看明代西南边疆治理[J].民族学论丛,2024,(04):56-65.
- [23]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4] 田澍.承前启后:明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J].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06):50-55.
- [25] 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6] 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J].历史研究,2022,(03):22-32.
- [27] 马冬梅,李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08):12-18.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g Dynasty's "Great Unification"

Cui Huaqi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Abstract:The Ming Dynasty, as a key dynasty that inherited the Yuan Dynasty and initiated the Qing Dynasty, has a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t takes "great unity" as its core, inherits the legacy of the Yuan Dynasty's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he barbarians", and constructs a diversifie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erritorial unity, cultural homogeneity, and economic symbiosis" through diversified practices of territorial governanc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connectivity. In practice, the Ming Dynasty relocated its capital to Beijing, established border defense stations, and strengthened territorial integration b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Tugui Riv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ism, integrate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deepen cult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Building an economic symbiotic network based on tea horse trade, tribute system, an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and nurturing the embryonic form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is governance practice not only consolidated the unity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an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multi-ethnic pattern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responded more strongly to erroneous arguments such as the "New Qing History" and "Inner Asian Historical View". Its experience has provided profound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improving border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the Ming dynasty; Unific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Diverse integr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Border governance